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三九期 ——
(二〇一二年三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3b)

【史实考证】	历史真相与未解之谜—— 近年来关于粉碎“四人帮”若干细节的新考证	韩 钢
【一家之言】	叶帅与粉碎“四人帮”	叶选基
【史海钩沉】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儒法斗争史研究	彭厚文
【人物访谈】	林彪秘书关光烈谈林彪	迟泽厚
【人物春秋】	初识关光烈	迟泽厚
【往事追忆】	为毛泽东一个人办的电视台	黄 海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实考证】

历史真相与未解之谜——
近年来关于粉碎“四人帮”若干细节的新考证

• 韩 钢 •

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35年。35年来，事情的真相和细节一直为人关注，为人乐道。当年惟妙惟肖的传说，后来变成绘声绘色的戏说。关键在于，官方几乎没有公布任何相关的档案文献。这未必是有意保密，因为那是一次政治风险极高的高层权力变更，所以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字记载。由于缺乏文字资料，相关当事人的叙述便显得颇富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当事人回忆、传记、年谱的公开和出版，以及媒体的采访，以往的传说和戏说很多得以纠误，事情的真相不少也得以澄清，但也留下了一些模糊不清或相互龃龉的疑点。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去一般说是叶剑英。主要当事人的回忆表明，事情可能要分为酝酿和正式提议两个阶段。还在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已经与一些当时被边缘化的党政军元老交流过对时局的看法，聂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等人曾先后以不同方式，向

叶表示了对“四人帮”可能控制局面的担忧，希望解决他们的问题。叶则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对此的态度和决心。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酝酿。

但酝酿是一回事，正式提出又是一回事。近些年研究的一大进展，就是弄清楚了正式提议的经过。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等人的谈话和回忆，都说明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的。除了叶剑英事先的酝酿、华国锋正式提出动议外，一些知情人近些年还提到，李鑫在毛泽东追悼大会（9月18日）后，也曾直接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

目前的疑点在于，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的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来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剑英如何反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据华的回忆，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中旬或21日。看起来，两者似乎差不多，但细究会发现《叶剑英年谱》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至于华叶密谈的具体内容，由于两位都已故去，已无法向人们披露了。

解决“四人帮”问题是如何谋划的？以往的说法，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也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据吴德口述，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不知情外，其余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了解此事。吴德还称，其中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都是华国锋本人亲自约谈的，只有倪志福是吴德受华的委托打的招呼。

汪东兴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汪在事件中的作用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也不公道。虽然汪迄今从未公开忆述此事，但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看，汪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华国锋回忆，他除了同叶直接商谈外，还找了汪东兴谈话，汪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华没有透露与汪商谈的时间，但吴德口述称，华曾告诉他9月11日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的意见。《叶剑英年谱》则记载，毛泽东生前叶就曾同汪交换过彼此看法。果真如此，汪就是分别从华、叶处得知这个动议的。至于详情如何，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有待汪本人的披露。

以往人们都以为一开始就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抓捕的办法，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透露出一个情况：在达成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共识后，曾经有过另一种考虑，即通过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华国锋、李先念回忆，9月16日，也就是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前两天，华和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会议室碰过一次头。吴德建议，用开会的办法解决。李先念表示质疑，还举了赫鲁晓夫上台的例子说明。华、李、吴权衡再三，考虑中央委员会有不少是“四人帮”拉进来的造反派成员，用开会的办法恐怕要冒风险，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故开会之策弃而不用。不过，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仍有不同记忆，华、李说是9月16日，而吴的记忆是9月26日或27日，两者相差了十来天。

据华国锋说，他不只是找了上述几位政治局成员商议解决的办法，更重要的还同叶剑英多次商量过此事。遗憾的是，华没有透露他同叶商谈的详情，因此华叶之谈仍是未解之谜。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的说法一直比较含糊或者片面。当事人的回忆逐渐相对全面地复原了历史。据华国锋、吴德的谈话或口述，准备工作主要是由华、汪、李三人分别商谈，由汪、吴组织实施的。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又分为三个部分，中南海内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的行动由汪东兴负责，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舆论单位的行动由耿飚负责。为此，汪东兴指挥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挑选了直接参与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五十来名官兵，吴德则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沟通，并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了北京卫戍区部队的直接指挥权。

关于准备工作，实际上还有一条线被人们忽视了，就是高层经由叶剑英同一些军方人士和党政军元老打了招呼，如李德生、张廷发和聂荣臻、陈云、邓颖超等。从某个角度说，这些也是一种准备，特别是同李德生（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廷发（空军司令员）打招呼，更是对可能发生的不测做好预设。

至于具体行动的经过，当事人的披露比较详细。这是近些年研究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特别是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陈长江、杨正泉、保育钧等人的访谈，都相当细致地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丰泽园内抓捕江青、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进驻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过去一直不清楚。吴德在口述中作了叙述，但仍嫌笼统，远不及对中南海内行动叙述详尽。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过去人们只知道会议结果，如今当事人的回忆提供了新史料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环。

过去人们只知道这次会议的结果，至于经过，则不知其详。吴德口述最早作了比较详细的忆述，周启才的口述则更为详尽。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作为工作人员旁听会议的是李鑫和周启才。会议从6日晚上十点开到7日凌晨四点，时长六个小时，主要是由华国锋、叶剑英通报抓捕“四人帮”的经过，然后作出了关于隔离审查“四人帮”和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之后，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作出了安排。值得注意的是，会上华国锋曾提议推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则坚持谦辞；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建议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认为这时的文件不可能解决“文革”的问题。

不过，无论是吴德的口述还是周启才的回忆，对会议安排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情况均寥寥数句，语焉不详。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旁听者），仅有四位尚健在。更进一步的情况，还待当事人披露。

~~~~~

【一家之言】

## 叶帅与粉碎“四人帮”

• 叶选基 •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如今都已垂垂老矣！回首这场席卷了中国大地每个角落，震撼了世界的政治风暴时，不同境遇、不同立场的人，都会做出深刻的反省和深思。但无论当年的境遇和立场如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今仍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识。正因为如此，粉碎“四人帮”，终结“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粉碎“四人帮”，有一个历史过程，是我党和全国人民，与“中央文革小组”及“四人帮”长期斗争的历史的继续和终结。在这场斗争中，大批革命元勋、志士仁人，还有众多无名烈士、党员和人民群众壮烈牺牲；也有不少人因为极“左”狂潮中的盲动而丧命，特别是那些青年学生。对前者，我们痛悼；对后者，我们痛惜！这一场付出血的代价、血的洗礼的政治风暴，留给我们太多反省与深思。

### ◇ 首场较量

就拿我的经历来说吧，这场内乱刚刚发动之时，我也被极左思潮弄得昏头转向，与世浮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造反派疯狂地打、砸、抢、抄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党乱军，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党的领导，反对造反派冲击党、政、军，他们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令我开始对极左行径有了怀疑，逐步深化了认识。这种抗争，同样教育和启迪了我党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及领导者，使他们逐步认识到“文革”将要带来的劫难，从而奋起抗争，坚决与“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展开激烈的斗争。所谓“二月逆流”，就是这场斗争的首场较量，其核心是老同志们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搞这场“文化大革命”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和人民军队的问题。

这个核心问题，始终贯穿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记得在“大闹怀仁堂”会议之前，叶帅在政治局会议上当面质问陈伯达，说：“老夫子，你是大理论家，我们是文盲、白丁，上海夺权要成立人民公社，那还要不要党的领导？政体改变了，国体是不是也要改？”叶帅随后当面向毛主席报告了他与陈伯达干了一仗的情况，毛主席接受了叶帅的意见，后来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让上海把人民公社的牌子取下来。“大闹怀仁堂”事件，老同志们同声谴责“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倒行逆施，启迪人们去认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 ◇ 庐山会议的复杂方面

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那场政治风波，我觉得应看到其复杂的方面。一方面是林彪等人因“中央文革”对他们所掌控的权力造成威胁，来个“清君侧”，翦除异己，这是无法翻案的；另一方面，也的确有众多的中央委员，特别是老干部们，如最具代表性的陈毅老总等，完全是出于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伙祸国殃民的不满而奋起声讨。还有三位上将，上书毛主席要求处理“中央文革小组”，幸亏周总理冒着风险，机智地保护了他们。庐山会议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确实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中央委员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倒行逆施同仇敌忾之故，绝不是上了林彪等的当、被煽动起来的。那个著名“简报”的负责人李雪峰等，最终不也证明他们并非与林彪为伍而得到了平反吗？可见庐山会议有其复杂的另一面。

庐山会议，林彪打错了算盘，以为利用大多数中央委员对“中央文革小组”不满，挟势可以令毛主席就范，却适得其反，引发了毛主席对林彪一伙的高度警惕，下决心要清除他们。他

在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之前，深夜召见了叶帅，当面向他交底，把叶帅这只冷冻的棋子又解冻了。毛主席开始布局展开清除林彪一伙人的斗争，先拿陈伯达开刀。党内又掀起了一场政治斗争风暴。

#### ◇ 邓小平复出

庐山会议以及林彪一伙最终灭亡，对毛主席也是极大的打击，他的情绪一度十分低落，进而有所反思，做出一些举措来纠正“文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就是邓小平复出的背景。

记得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向毛主席写信表达了希望能做点工作的要求，在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时，叶帅恰好先到了，毛主席把他叫到跟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小平来信了，要求做点工作，我看可以在东兴那边做点室内工作”，说到这里，康生进来了，主席不说了，把信装到口袋里去。叶帅意识到主席开始考虑解放邓小平了，但没想到毛主席又把王洪文这样的造反派头头调上来，捧上了天。同时毛泽东也把他器重的老实人华国锋调进中央。王洪文上台，形成了所谓“四人帮”。但毛泽东最终还是没有把党的最高领导权交给“四人帮”，而是交给了华国锋。

林彪机毁人亡，周总理有过一次痛哭，在场者一时都迷惑不解，实则是总理痛感政治形势更加恶化了，“中央文革小组”那伙人会变本加厉地乱党、乱军，日子会更加难过，他成了他们的头号打击目标。事实证明了总理的预见，批陈批林，之后就是批周，差点把他打成第十五次路线斗争的头子。总理晚年，又做了件大好事，他不顾重病在身，在邓小平、叶剑英等倡议下，飞往长沙与毛主席长谈，阻止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使我党大权没有旁落于“四人帮”手中。

毛主席苦思下一步棋怎么下。他自始至终都把总理作为最得力的助手，但让他接班又不放心，从而想起被他冷冻的邓小平。同时毛主席出于其“文化大革命”的深重情结，又把上海青年造反派的头头王洪文调上来，苦口婆心地言传身教，耐心做党内高级干部的说服工作，让大家接受，想把王洪文培养为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后期，形成了有周总理领导，邓小平、叶帅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与“四人帮”展开斗争的历史时期。

#### ◇ 叶帅全力以赴支持邓小平

邓小平的复出，成为我党与“四人帮”展开白热化斗争的中流砥柱。叶帅全力以赴支持邓小平，他曾说过，“他在前方打仗，我在后方送子弹，有时我们一起冲”。在总理病重期间，毛主席对王洪文的表现不满，失望，让他回上海学习、调研。叶帅随即向毛主席上书，建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复出后，大刀阔斧全面整顿，和“四人帮”对着干，真是豁出来了！他冒着风险做上海马天水的工作，反而被马天水告了状。

康生病重住在钓鱼台，得悉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又成了风派，把总理、邓小平叫到钓鱼台，说江青、张春桥有历史问题，让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不满与警惕，把毛远新调来当联络员。邓小平一连串的举动，包括把叶帅向他提供的江青在学大寨会议期间大放厥词的材料批呈毛主席，转刘冰的信等等，都触动了毛主席要守住“文化大革命”底线的神经，意识到邓小平同叶帅等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可以说从策略上过早暴露了。毛主席作出了反击，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再说叶帅这边。叶帅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被“中央文革小组”和“四人帮”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无时无刻不在寻机打击他，要把他打倒，他的几位子女、女婿都被抓起来坐了牢，

儿子叶选宁还丢了一只胳膊。城里的住所也被造反派抄了家，这在当时最高一级在职的老干部中，是独一无二的。叶帅的压力之大，外人难以想象。江青为了打击他，无所不用其极，擅自召开了批林批孔大会，大讲叶帅的“走后门”问题，企图搞臭叶帅。尔后又在政治局会议上逼叶帅做检讨。叶帅被迫向毛主席写了检讨书，但巧妙地点出这是江青迫他做的。毛主席看出来，作出了著名的“反走后门，三箭齐发”的批示，制止了江青一伙的行径。张春桥说“用检讨来告状也是一大发明”，发泄对叶帅的不满。

邓小平复出后，叶帅依然全力以赴地与邓小平配合，在稳定军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之时，叶帅虽然也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但在周总理逝世时，政治局讨论总理治丧，仍然义无反顾地坚持要让邓小平致悼词，说“现在还是由小平主持工作，理由由小平来致悼词”，叶帅跟我们说“在这个时候要支持小平”，他们始终都是与“四人帮”坚决斗争的最亲密战友。

#### ◇ “四五”事件，充分表达了人民的意愿

总理的逝世，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对“四人帮”的政治风暴。叶帅每天都以振奋的心情，让身边工作人员和子女汇报天安门广场人民群众群情激昂的情形，看他们抄来的诗词，甚至不顾会被“四人帮”爪牙盯梢的风险，驱车到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要亲眼看看这波澜壮阔的场面。“四五”事件，令他下定决心与“四人帮”坚决斗争。粉碎“四人帮”后，率先向华国锋等提出为“四五”事件平反的，也是他。“四五”事件，充分表达了人民的意愿，预示了“四人帮”必然灭亡的命运，为粉碎“四人帮”打下了坚实政治基础。

邓小平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壮举，与而后的粉碎“四人帮”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邓小平对粉碎“四人帮”，同样做出了历史贡献。

#### ◇ 叶帅做军队高级干部的工作

叶帅很注意斗争策略，他在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6月24日——7月15日）上有一个讲话，其中有一段话是脱稿讲的，主要是针对江青插手军队搞阴谋的情况。他对高级干部们说，“现在，有些人背着军委发材料”，我们“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以后要听军委的”。对军队高级干部敲了警钟。这段脱稿讲话，叶帅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在开讲之前，叶帅就让王守江秘书将这段话写在另一张纸上，夹在正式讲稿里。那时，“四人帮”的核心成员王洪文、张春桥都在中央军委身居要职，他们几乎每天都到会，尽管他们在会议期间一言不发，却时刻注意着会议的动向。也确实如此，张春桥会后就向叶帅办公室要叶帅讲话记录，叶帅很注意斗争策略，没让“四人帮”抓到辫子。

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帅就把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讲话向一些军区的主要领导一个一个单独传达了。据原叶办主任王守江回忆，当时，叶帅听完主席的讲话后，回来就把记录稿给他了。叶帅的记录稿有特点，有横着记的，有竖着记的，不易辨认。他让王守江把记录稿整理出来以后，去找纪登奎核对，纪登奎记得很仔细。核对整理出来后，叶帅就让王守江留着这份记录稿。在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期间，叶帅约见一些军区的主要领导，谈话前，叶帅让王守江先把主席讲话的记录稿给他们看，让他们心中有数。等他们看完以后，叶帅再过去见面。他们都向叶帅表态，说叶帅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听中央军委的。这就统一了他们的思想和立场，对稳定军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这件事，在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招呼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打着追谣言旗号，直点广东、四川是谣言发源地，引起叶帅警觉，意识到不是空穴来风，是冲着他来的，即

通过肖洪达（原叶办主任，时为广东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去询问韦国清，韦国清请肖洪达转告叶帅：绝对没有向任何人讲过，请叶帅放心，叶选宁也找到了赵紫阳处询问；赵紫阳也做出了同样的回答。这才没让江青一伙人抓住。

#### ◇ 老同志们忧心忡忡

粉碎“四人帮”，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叶帅、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临危受命，肩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浩劫。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在京的高级干部们就提出了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党和国家的命运又处于危难之中，老同志们都闻讯而动，互相串联，议论纷纷，叶帅的内心也极为忧虑。老同志中最突出的是王震，他走街串巷找战友们商议，向叶帅提出要把“四人帮”抓起来，叶帅向他举起拇指摇头，意思是主席还活着，行不通。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人。

不少老同志建议叶帅尽早与华国锋取得联系，联手解决“四人帮”。熊向晖同志告诉叶帅，他在接待杨振宁访华时，江青制造混乱，遭到华国锋的坚决抵制，他手中留存的华国锋在科学院座谈上的插话，无不是在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行为，这说明华国锋是抵制“四人帮”，与“四人帮”作斗争的；王震也以他在国务院工作的体会，向叶帅介绍了华国锋的表现，举出了在计划会议期间，上海的黄涛与辽宁的杨春甫，禀承“四人帮”的旨意，在会议上疯狂攻击国务院，妄图把谷牧拿出来当靶子，整垮他，夺国务院的权，纪登奎都顶不住了。谷牧向华国锋汇报了他的险恶处境后，华国锋当机立断以唐山地震的名义让会议收场，保护了谷牧。王震认为华国锋这个人是坚决抵制“四人帮”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本人，他来中央工作后，亲身体会到“四人帮”特别是江青所表现出来的打着主席的旗号，大发淫威，横行霸道，胡搅蛮缠，对他有极大的震动。主席去世后，他和叶帅谈到要把他们抓起来隔离审查时，坚决主张一定要把江青也抓起来。叶帅在一起共事的中央工作中，早就看到了华国锋不屑于与“四人帮”为伍，抵制与反对“四人帮”的表现，他打心眼里钦佩华国锋的胆略。对华国锋主持解决“四人帮”，叶帅充满信心。其实只要是稍微有点党性良知的人，都会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何况华国锋呢？！这也是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对他们的行为十分厌恶，拉开距离不与之伍的原因。“四人帮”处于极为孤立的境地。

#### ◇ 叶帅与华国锋达成共识

叶帅是在1976年的7月间，首次去华国锋家拜访，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着重提出我党不能搞第二武装，直指“四人帮”妄图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阴谋。两人谈得十分融洽，打下了联手解决“四人帮”的政治基础。

真正启动行动解决“四人帮”，是毛主席去世之后。那时候形势很紧张，如：毛主席逝去的当天晚上的政治局会议，本来是要讨论如何处理毛主席治丧的问题，江青等却置会议议题于不顾，整晚纠缠继续批邓，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会都开不下去了，华国锋始终岿然不动，坚决不理睬江青等人的无理取闹。在此关键时刻，叶帅挺身而出，坚决支持华国锋，他大声疾呼：“现在主席逝世了，当前最重要的是全党要坚决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现在要讨论的首先是如何处理主席的治丧问题，你们这样节外生枝，对得起主席吗？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迫使王洪文、张春桥等不得不点头称是，会议才得以在次日早晨散会。

那天晚上也是我们在“文革”岁月中最紧张的一天，因为我们知道叶帅去中南海开会，但彻夜不归，我们意识到出了特大事件，十分担心老人家的安危。叶帅于第二天9点左右才回到驻地，沉痛地告诉我们主席去世了。从此，两军对垒的斗争开始了。“四人帮”的矛头首先指向汪东兴，他们想把主席的文件拿到手，好借此尚方宝剑开刀杀人。叶帅打电话告诉汪东兴，说“主席在时你保卫主席，主席去世了你要保卫主席的文件”，还让警卫员马西金询问汪东兴处的警卫情况，汪东兴让马西金送点子弹过来。此前，叶帅与汪东兴他们曾通过澳门的关系，进口了一些手枪作警卫之用，可见当时的形势之紧张。

#### ◇ 华国锋下定决心

华国锋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江青等天天缠着他无理取闹，正常的会议都开不起来，根本无法视事，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已刻不容缓。而叶帅方面，老战友纷纷登门造访，表达了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无比忧虑，希望叶帅迅速地采取措施。

在此关键时刻，华国锋下定决心果断地解决“四人帮”问题，派李先念去拜访叶帅，征询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四人帮”，由此可以说明，他们此前已经有了要解决“四人帮”的共识了。之后，叶帅与华国锋多次交换意见，又会同汪东兴制定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上报华国锋。抓捕“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地点，只有华、叶、汪三个人知道，是严密封锁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的。抓捕“四人帮”，汪东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立了大功。至于负责外围的吴德等人，也是让他们坐守待命，怀仁堂的行动一得手，汪东兴立即通知他们动手。

叶帅在军队系统方面也做了相应的举措。他让王守江秘书向空军政委张廷发面授指示：如病情允许，即从医院（张时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回空军。张廷发当天下午即回空军。同时让杨成武守在总参作战部，以策应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这里也要提一下陈锡联，他也是坚决反对“四人帮”的，也做了配合工作；还有参与在怀仁堂抓捕“四人帮”的警卫干部和警卫战士，他们是抓捕“四人帮”的功臣。

#### ◇ 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

关于抓捕“四人帮”当晚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驻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这里引用几段会议列席者、原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的回忆：

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

叶剑英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二十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 he 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周启才在回忆中还说，在会议召开之前，他看到华国锋与叶帅并排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商议事情。其实就在这时，华国锋已向叶帅提出请他来担任党的主席，叶帅立即表示不同意，讲的内容与上面所引的政治局会议中的讲话完全一样。叶帅确实从心里拥护华国锋接班当党中央主席。

“四人帮”方面，在主席去世后，他们也意识到形势对他们很不利，在北京成了孤家寡人。但他们绝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也四处活动、放风，特别是江青，据说她不知道中了什么邪，鬼迷心窍，要去十三陵转悠，弄得警卫们手忙脚乱。到了定陵，把橱窗里的皇冠拿出来摆弄，还要在那里过夜。张春桥听说此事后，据说说了一句“完了，完了”，看来张春桥骨子里也充满了封建迷信思想。江青他们也试图在部队里活动，如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就跑到南口坦克一师去活动，引起了叶帅和华国锋的高度警觉。他们大肆武装上海民兵，阴谋负隅顽抗，但均以失败告终。

#### ◇ 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自发地走上街头欢庆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我们这一代人从未看到过如此欢欣鼓舞的盛大场景，可见是大快人心的伟大盛事！邓小平用前所未有的措词，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情不自禁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陈云在1977年3月的工作会议书面发言中说这件事意义重大，“只有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和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全党地位两件事可以相比”，予以最高历史评价。

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的再复出，提出了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把我党从教条主义、极左思想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经济上，打破单一经济结构，注入了经济多元化结构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这些政治与经济的解放，使我国这些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经济建设成果。这难道不应当首先归功于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所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吗？！

我们这一代人亲历这一段艰难岁月，决不会遗忘历史的教训！对所有为这一伟大胜利而做出历史贡献的功臣，我们满怀崇敬之情！这是人民的伟大胜利，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 《南方周末》2011年10月1日

~~~~~

【史海钩沉】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儒法斗争史研究

• 彭厚文 •

1973年七八月间，毛泽东针对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工作和党内外怀疑和否定“文革”，的思潮，发表了一系列谈论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言论，否定和批判儒家，肯定和赞扬法家。他的目的，是含蓄地发出警告，不要否定“文革”，否则就是“尊孔反法”，开历史倒车，与林彪和历史上的反动派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的这些言论，被“四人帮”集团所利用，引发了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和“批林批孔”运动。

◇ 儒法斗争史研究的由来

从时间上看，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在“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发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73年9月，“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学习与批判》创刊号发表了《论尊儒反法》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后，当年第10期的《红旗》杂志以及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相继全文转载，由此可以看出“四人帮”对它的重视。

《论尊儒反法》提出了儒法斗争的概念，认为“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儒家提倡“礼治”，法家提倡“法治”，儒家主张守旧，法家主张革新。儒家和法家的斗争不是学术主张之争，而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在思想政治战线上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儒法斗争不仅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而且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着”，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文章提出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弄清楚儒法斗争的阶级本质，认为这“对于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这篇文章揭开了儒法斗争史研究的序幕，并为后来的儒法斗争史研究定下了基调。

此后，“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及其追随者又发表了一批研究和宣传儒法斗争史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罗思鼎的笔名在《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发表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唐晓文在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等。

《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除了以批宰相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外，还在《论尊儒反法》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儒法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认为秦始皇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就是由于执行了法家路线，因此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巨大胜利，也是法家思想的巨大胜利”。

《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则为法家找到了一个先驱——鲁国的少正卯。文章认为少正卯主张实行同孔子完全对立的政治路线，即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也就是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因而遭到孔子的忌恨，所以后者一在鲁国掌权，就杀害了少正卯。文章还认为，少正卯和孔子之间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革新和保守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新兴封建势力和没落奴隶主两个阶级之间尖锐斗争的表现。他们之间的斗争“揭开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斗争的序幕”。在“四人帮”倡导的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中，这篇文章的恶劣作用在于通过渲染少正卯和孔子之间的斗争，为儒法斗争找到了一个源头，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儒法斗争不是一个虚构的概念，而是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从而进一步论证了研究儒法斗争史的必要性。

◇ 儒法斗争史研究的演变

儒法斗争史研究的开展，为“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做了理论上的准备。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发动之后，它成为了这一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前期，它主要是为了配合对孔子的批判，给孔子及儒家学说树立一个对立面。以此来进一步说明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反动本性”，参与其中的人数也不多，主要是“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及其追随者。“批林批孔”运动进行了将近半年之后，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这就是从1974年6月开始，研究儒法斗争史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

当时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一是因为“批林批孔”运动出现了混乱。在运动中，一些群众又成立战斗队，搞大串联，“文革”前期的动乱局面重新出现。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文件，提出要加强“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这迫使“四人帮”调整斗争策略，加强“文斗”。以避免“武斗”遭到限制和约束后运动出现冷场的情况。另外，随着四届人大的日益

临近，“四人帮”加快了夺权的步伐。为了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中占据有利位置，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他们需要进一步大造政治舆论，一方面打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另一方面肉麻地吹捧和抬高自己。因此，“批林批孔”运动的这种变化。主要是服务于“四人帮”的政治需要的。

1974年6月12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的成员，座谈如何使“批林批孔”运动更深入、更普及、更持久的问题。江青提出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观点。并要这些写作班子把儒法斗争一直弄下来。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作长篇讲话，提出要重视和开展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和宣传。她说：“批林批孔要深入、持久、系统、普及，必须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批才能深入。”“单纯批儒，没有对立面，不能从路线高度来看，看不到路线斗争的规律。”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以培养理论队伍为由，提出要学习历史，要读一点法家的著作，要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社论说：“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对林彪、孔老二的批判如何深入，如何普及，如何持久，如何系统化，以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社论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培养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各级党委要把加强理论队伍作为深入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为了培养理论队伍。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除了“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外。“还要学历史，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读一点法家的著作”。社论根据江青所谓的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观点，提出：“刘少奇、林彪都是尊儒反法的，苏修也是尊儒反法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我们要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坚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反对倒退，坚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复辟资本主义。”这篇社论实际上是开展大规模儒法斗争史研究的动员令。此后，开展儒法斗争史的研究，进行评法批儒，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内容。

◇ 儒法斗争史的研究扩大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

由于儒法斗争史的研究成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内容，因而儒法斗争史的研究由以前的仅有少数人参与其中而扩大为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后来一般被称为评法批儒运动，但也有人把它称为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如粉碎“四人帮”后，一位历史学家写的批判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1973年党的十大以后，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运动。可是在‘四人帮’操纵指挥下，这个运动很快被篡改改为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应该说，把这场运动称为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更合适一些，因为从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批判文章来看，评法批儒的说法较为少见，更多的是将其称为“研究儒法斗争”或“儒法斗争史的研究”。

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不是在“批林批孔”之外发动的一场运动，而是在“批林批孔”的旗号下进行的，仍然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一部分，只不过更多地塞进了“四人帮”的私货而已。

研究儒法斗争史作为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不仅理论工作者、史学工作者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连党政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都被卷入其中。当时的报刊上经常可以见到有关党政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法家著作，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报道。

1974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天津站工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宣讲儒法斗争史》，对天津站工人研究和宣讲儒法斗争史的情况进行了报道。12月1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凡是搞分裂倒退的都没有好下场——陕西省汉中县建国大队贫下中农围绕“斩韩信”史实研究西汉初期的儒法斗争》。这篇报道说，陕西省汉中县汉水公社建国大队的贫下中农，在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的“拜将台”遗址前。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围绕刘邦“斩韩信”这一历史事实，研究了西汉初期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

从这些报道来看，研究儒法斗争史成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一项政治任务。其实，就当时大多数工人、农民和相当一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平来说，根本不具备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能力。所谓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只不过是借研究之名，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中灌输“四人帮”的那一套儒法斗争的理论，为他们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做舆论准备。

为了推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四人帮”还组织人员撰文介绍和宣传历史上的所谓法家，选编和出版法家著作。1974年7月5日至8月8日，他们以国务院科教组等单位的名义，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法家著作的选编、注释、出版和研究，是这一时期儒法斗争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四人帮”建构和宣传他们那一套儒法斗争理论的重要途径。

◇ 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同“四人帮”现实的政治需要结合得更加密切

如果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前期，儒法斗争史的研究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图，那么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后期，开展儒法斗争史研究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四人帮”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并为他们进一步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做舆论准备。

1974年，虽然“四人帮”还在党和国家的权力中枢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他们已经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产生了严重的忧虑。当时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毛泽东年岁已高，身体状况日趋恶化，在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毛泽东逝世后，如果周恩来还健在，他将是“四人帮”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主要障碍。虽然毛泽东无意让周恩来接班，但以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地位、威望和影响，他仍有极大的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依靠“文革”起家的“四人帮”无疑凶多吉少，政治前景不容乐观。

鉴于此，“四人帮”一方面视周恩来为眼中钉，急欲除之而后快，采取种种手段打击、排挤周恩来；另一方面，为了能在毛泽东逝世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他们竭力争取在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中占据有利位置。当时，四届人大召开的日期日益临近，“四人帮”野心勃勃，企图争取由他们组阁。这两个方面，就是当时“四人帮”的政治需要。他们倡导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这种政治需要出发的。

在这一时期的儒法斗争史研究中，“四人帮”首先是把所谓的儒法斗争定性为两种思想、两种路线的阶级斗争，认为这种斗争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思想政治领域的一场阶级斗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着。一直持续到现在，各个历史朝代、各个历史时期概莫能外。然后强调要古为今用，把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同现实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对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更好地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

“四人帮”通过批判和丑化儒家。把攻击矛头几乎是不加掩饰地指向周恩来。在这一时期

的儒法斗争史研究中，“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竭力渲染秦始皇死后赵高的“复辟”事件。批赵高成为这一时期批判儒家的重点。罗思鼎在《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发表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中，大批宰相，用江青的话说，就是一口气点了六七个宰相的名，批判这些宰相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搞复辟。实际上是以以来影射攻击周恩来，但并没有提到所谓赵高的“复辟”事件。

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开展以后，罗思鼎在《红旗》杂志1974年第8期发表了《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随后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煞有介事地构建了一个所谓赵高“复辟”的故事，认为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秦始皇对奴隶主复辟镇压得不够彻底，以致让“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地地道道的儒”赵高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除担任掌管车马乘舆的中车府令外，还兼管皇帝的印玺和起草机要文件。后来，赵高就在秦始皇死后，发动政变，篡夺了秦王朝的政权。并用儒家路线代替了法家路线，从而激发了阶级矛盾，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这样，就把一起封建时代司空见惯的宫廷政变，牵强附会地演绎成儒法斗争，演绎成儒家的“复辟”。这篇文章发表后，“四人帮”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又先后发表《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抓住所谓赵高的“复辟”事件大做文章。

综观当时对赵高的批判，主要强调如下四点：一、赵高是在秦始皇病重死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乘机发动政变；二、赵高发动政变之时，身居丞相要职的法家李斯本来有可能搞掉赵高，“粉碎复辟势力的政变阴谋”。但他“妥协动摇，铸成大错”；三、赵高篡权后，便以复辟的儒家路线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并对“秦始皇的法家领导集团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秦始皇时代的法家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四、赵高篡权，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变中央政权的法家路线”，“因此，夺得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必须把路线问题放在首位，对于反动阶级改变革命路线的阴谋诡计，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从上述四点可以看出，批赵高的实质是“四人帮”为了避免在毛泽东逝世后被“一网打尽”，要对可能出现的赵高式的人物发动政变篡权提前敲响警钟，并预作防范。在当时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中，谁最有可能成为“四人帮”眼中的赵高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四人帮”批赵高，就是打着维护“革命路线”的幌子，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通过抬高和吹捧所谓的法家，替“四人帮”涂脂抹粉，为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制造舆论。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在内容上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批林批孔”的同时，大力宣传、抬高和吹捧历史上的所谓法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家的宣传、抬高和吹捧，其声势甚至超过了对儒家的批判。这一现象，是1974年6月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所不曾有的。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江青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与她的提倡和诱导是密不可分的。1974年6月14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中，除提出要重视和开展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和宣传外，还提出要大力宣扬法家。她说：“现在要深入批林批孔，必须在批判儒家的同时宣扬法家，这样才能理解历史上的路线斗争。”

“四人帮”对法家的宣传、抬高和吹捧，是如何服务于其政治需要的

◇ 强调儒家和法家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

为了突出儒家和法家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当时有的文章竟然歪曲历史，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实际主要是两家争鸣，一家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一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其中，法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它是进步的力量，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反动的，是腐朽没落的势

力”。儒法斗争的实质“是搞‘克己复礼’，维护和复辟奴隶制，还是实行革命，建立和巩固封建制”。这样，法家就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众多学派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进步力量的代表。

有的文章把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进步与落后的斗争，革新与守旧的斗争，爱国与投降的斗争，都概括为儒法斗争，并认为儒法斗争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法家就进一步成为正确、进步、革命、爱国的代名词。

有的文章则直接秉承江青的旨意，提出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的观点。这样，“四人帮”就成为了当代的法家。因为当时衡量进步与落后的标准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按照这样的标准，“四人帮”自然是进步力量的代表，当代的法家也就非他们莫属了。所以，强调儒家和法家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把“四人帮”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者。

◇ 吹捧吕后和武则天

在这一时期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中。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吹捧吕后和武则天的文章。吕后被说成是汉高祖刘邦死后法家路线的推行者，武则天则被推崇为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女政治家。

在1974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中，对吕后有如下评价：“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后，继续推行了法家路线。”罗思鼎在《学习与批判》发表的《论西汉初期的政治和黄老之学》一文中，也吹捧吕后执政“竭力守住刘邦的法家路线不变”，“为以后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武则天，梁效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4年第4期发表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是一篇吹捧武则天的代表作。这篇文章把武则天称为“法家女皇武则天”。认为她“和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法家皇帝一样”。“有着十分鲜明的反儒色彩”，在其登基做皇帝以后。粉碎了守旧派的阴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实行了法家革新路线，“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

其实，这些文章都是秉承江青的旨意，借吹捧吕后和武则天来吹捧江青，为其篡权做舆论准备。

◇ 强调中央政权中有一个“法家领导集团”的重要性

梁效在1974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中，根据对西汉初年所谓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研究。煞有介事地总结出一条所谓的“历史经验”，这就是：为了保证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在中央政权中必须长期保持一个法家领导。集团。这实际上是赤裸裸地为维护和巩固“四人帮”的政治地位，并进而为他们夺取更大的权力制造舆论。

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开展以后，研究儒法斗争史成为历史学的中心内容和最重要任务。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政治、学术思想和不同政治、学术派别的斗争，都被解释成儒法斗争。有人甚至提出“必须以儒法斗争为一条线来重新改写整个中国史”和中国哲学史：还有人提出“儒法斗争这条线索的明朗化，使得中国思想史上学派、体系、范畴，都要重新加以研究”。还有文章公然提出，历史学的研究要向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学习，认为刘知几“是替武则天推行法家路线制造舆论的一个较突出的代表”。因此，在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中，历史学完全成为“四人帮”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中，“四人帮”还提出，要通过这一运动，“推动各条战线的斗、

批、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这样。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学术领域。事实上都受到了“四人帮”那一套研究儒法斗争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 儒法斗争史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究的破坏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儒法斗争史研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四人帮”进行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它对于文化学术的进步，不仅没有产生任何的推动作用，相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其核心和代表是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风俗礼仪，无不打上了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毋庸置疑，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为维护西周的旧制度而产生的学说，有着保守、消极、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在封建时代，它曾长期充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但是，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两千多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代表，除了它长期被封建统治阶级当做统治工具，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推广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不容否认的——这就是在儒家文化中。存在着一些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都能认可和接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

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有一部分是正面的，积极的，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优良品德的形成，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产生了长久的促进作用。这一部分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不仅对于中华民族的维系和生存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强盛也是不可缺少的。但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中，儒家成为了复辟、反动、落后、保守甚至卖国的代名词，被作为法家的对立面而遭到全面、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儒家文化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形象，当时被强制灌输到了几乎是所有中国民众的脑海中，从而使得儒家文化的传承。出现了一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断裂。

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对中国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学的研究造成了空前的破坏。这种破坏，一是把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造成了历史研究的极大混乱；二是把学术研究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以实用主义代替实事求是，严重地败坏了学风。这方面造成的破坏，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就遭到了人们的口诛笔伐。

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在1977年第2期《历史研究》发表的《“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中，对“四人帮”开展儒法斗争史研究的政治目的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这篇文章认为，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中，“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把历史学变成了搞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他们虚构历史公式，拼凑出一个从古到今与儒家相对立的法家阵线，炮制大量所谓总结儒法斗争历史经验的论文，只不过是希望披着学术的外衣，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盛行。实用主义代替了一切，对中国的历史学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

1977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扈世纲的《评“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一文，认为“四人帮”搞历史就是为了影射，就是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从这一目的出发，他们对历史任意解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颠之倒之，翻之覆之，玩弄于股掌之上，仿佛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存在。这种“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与古为今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根本对立的。

黎澍、扈世纲等人对“四人帮”的批判说明，“四人帮”对历史学所造成的破坏不仅是空前严重的。而且是有目共睹的。

□ 《党史博览》2011年第12期

~~~~~

## 【人物访谈】

林彪秘书关光烈谈林彪

• 迟泽厚 •

迟泽厚：有份文件说，全国解放之后，林彪长期称病，也就是装病。他到底有没有病？

关光烈：当然有病。最早的病是1938年被国民党晋军误击的枪伤，以后的怪病则主要来自衡宝战役。1947年我在东北见过林彪一面，那时候看他身体还是不错的。1949年南下作战，总是抓不到白崇禧部队的主力，49军又在青树坪吃了一点小亏，他很着急。他打仗不胡来，整天思考，不断调整部署，几天几夜睡不着觉。衡宝战役一结束，白崇禧最精锐的部队被消灭了，他也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回武汉治疗。以后他又到北京，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决定给他注射“苯巴比妥”，也叫“鲁米那”，是一种有助于睡眠的镇静药。林彪出事之后，有人说他吸鸦片、扎吗啡，其实就是这种药。我到林彪那里工作以后，他仍天天打这种针。给他打针的是一个男卫生员——林彪身边没有女工作人员，叶群说这是为了照顾首长的影响。林彪一般晚11点钟睡觉，睡前打针，打过针后一般就不能再干扰他。第二天起床之后，林彪经常会向打针的战士讲他昨夜的感受，不断总结经验。林彪的怪病，主要是神经过度兴奋。他怕光，怕水，怕风，说拉肚子就拉肚子，说感冒就感冒。他患感冒也和别人不同，光出汗，不打喷嚏。感冒了，他也不躺，端坐在沙发上。很多医生看不透他的病。林彪身上还有一颗子弹头，卡在骨头缝里，因为手术有危险，一直也没有取。若说林彪没病也可以，他的大部分内脏是好的。

迟泽厚：有人揭发林彪装病，说他一顿饭能吃一只兔子，是这样吗？

关光烈：哪有这事！林彪饭量很小，而且吃得很怪。他的菜除了加盐之外不加其他佐料。一顿饭经常是一条小鱼，几片瘦猪肉，一个青菜，一个汤，一个小馒头，食品路子越吃越窄。

迟泽厚：林彪对在庐山取代彭老总当国防部长，是什么心态？

关光烈：林彪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我没听见他在私下里谈论彭德怀。但我曾两次经历过他要求不当国防部长。一次是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挨了批，罢了他的官，叫林彪当国防部长。有一天休会，我到林彪的房子（我不与林彪住在一起）里去，他要我给总理打个电话，说他身体不好，不宜当国防部长。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请总理向毛转报。当时叶群在场，但她不讲话。我转身出门往山下走，走了不过二、三十步，叶群便从屋里出来把我叫住，她叫我先别打这个电话，说这个事儿她还要和“首长”商量一下。以后这件事便没下文了，不知道叶群是怎样和林彪商量的。

第二次是1962年3月的一天，林彪患了感冒，叶群坐着林彪的“吉斯”汽车去了王府井百货大楼。林彪要我给毛写个报告，说他身体实在不行，请求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我当场拟了个稿子，念给林彪听，他说可以了，我即到办公室誊抄。誊清后封好，等林彪的车子回来后发出去——当时林彪那里只有这一辆汽车，而且也只有这一辆车能进中南海。叶群回来了，她一见我就问她出去后有什么事。我把林彪叫我写信的事讲了。她马上紧张地问：发走了没有？我说还



没有发。她松了口气，吩咐：压下，压下！等我的消息。她还再三交代：以后只要她不在家，林彪交办的事，不管多么紧急，都要等她回来以后再作处理。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就这样又作罢了。她和林彪讲了些什么，不得而知。

迟泽厚：你怎么看叶群这个人？

关光烈：这个女人是有野心的，也有手段。林彪对“出山”并不积极，甚至有些迫不得已。但是叶群喜欢，林彪不“出山”，她就无法出头。说到底，她是想当第一夫人。林彪和叶群是有矛盾的。从表面看，叶群还是怕林彪，顺从林彪，讨好林彪，但是，她有一套对付林彪的办法，她对林彪也有不小影响。叶群干的很多事情，林彪是蒙在鼓里的。

迟泽厚：你怎么看毛、林关系？

关光烈：说点具体情况吧。秘书给林彪读文件，只要是其中有毛的指示，他都要把文件留下，然后一遍两遍地认真阅读，圈圈点点，画杠杠，琢磨指示的真正意思，考虑如何去贯彻、迎合。要说林彪对毛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我看未必。

迟泽厚：很多人反映，林彪待人冷漠，他是怎样看待和处理人际关系的？

关光烈：林彪确实性格孤僻内向，少言寡语。我曾问过林彪的三弟，他说林彪从小就是这样，不爱讲话。所以，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带来的毛病。他不爱交际应酬，从不串门，最烦接见、会见外宾和上天安门之类的活动。他和罗（荣桓）帅是几十年的战友，在工作上应该说关系不错，却没有私交。不过1963年12月得到罗帅去世消息时，他还是不顾刚下过大雪，行车不便，叫我立即备车，陪他一起去医院，单独与罗帅遗体告别。在众多高级军事领导人中，林彪最器重的是粟裕。他曾叫我代表他专门去医院看望粟裕，粟裕也很坦然，并没有说些如何感激之类的话。尽管林彪不愿与人交往，但对上门的客人他还是以礼相待。我在“林办”期间，他指示凡是政治局委员一级的领导人，可以随来随见。“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此外，他还特别交代：刘亚楼、陶铸、黄永胜、韩先楚这四个老部下要来见他，也不必请示。对部属，他善于发现和使用他们的长处，一般的全才他倒未必重用。他的自尊心很强，但在工作中出了问题，他一般不责怪下面。

迟泽厚：你见过林彪那个“手令”吗？

关光烈：林立果把我诓到北京，叫我参加他们的活动，给我看了据说是林彪写的“手令”。“手令”不止一份，有横写的，也有竖写的。他们拿出这个东西，我不感到奇怪。我在“林办”时，叶群就对秘书们说，现在首长写字困难，大家可以模仿首长的笔迹，必要时代批代签。有的秘书很积极，学写林彪的字。我公开反对，我说：你们要学我管不了，但是我不学。“小舰队”中也有人模仿林彪的字。“小舰队”有些人还是很聪明的。

迟泽厚：有件事情我不明白，你老兄是个明白人，又在中央当了那么多年秘书，既然你判定林立果是在打着林彪的旗号干非法勾当，你为什么不到中南海去报告？你报告了，不就可以避免这次劫难了吗？

关光烈：现在回过头去看，事情比较清楚了。可是那时候，事情来得太突然，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知道，上面的关系很复杂，一边是伟大领袖，一边说是副统帅，我离开北京六、七年了，不了解内幕情况，乱碰乱撞，弄不好就会捅出天大的娄子！何况我行动也不自由，林立果他们有人监视我。再说，我离开中央机关多年，就是真想向最高层反映情况，也不太容易，

干脆算了，认倒霉了，听天由命吧！反正我不干坏事就是了。

迟泽厚：林彪想没想过他可能的结局？

关光烈：林彪是个感情深藏不露的人。但据我观察，他对自己的结局是有考虑的，但是他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那么惨。

□ 《南方周末》2012年2月16日

~~~~~

【人物春秋】

初识关光烈

• 迟泽厚 •

据我所知，关光烈大约是在林彪身边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

关光烈和我，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从野战部队调到中南军区机关的，但他是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我在军区司令部办公厅，给军区参谋长黄永胜当秘书，彼此分住两个大院，又无工作交往，所以并不相识。1955年，中南军区的主体部分改编为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军队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陶铸虽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但因他主要担负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工作，所以军区党委的一般活动都由第二书记黄永胜主持。按传统党委工作由政治机关负责，关光烈被指定为军区党委秘书，负责通知开会和作会议记录。黄永胜决定开会，便由我通知关光烈，由他负责落实。开得最多的是军区党委常委办公会，有时个把月甚至十天八天便开一次，我与关光烈接触频密，彼此谈得比较投机，在那运动不断、动辄得咎的年代，不须互相戒备。

◇ 林彪和W秘书的一段插曲

关光烈于1959年1月调任林彪的秘书。这次调动纯属偶然，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话说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林彪几乎每年冬天都到广州过冬，一住就是一两个月，甚至两个月以上。为此还给叶群在广州市政府安排了个副局长之职，林立衡、林立果姐弟则在军区大院对面的八一小学随读。

1958年12月，林彪又一次全家南下，先在广州住了几天，林彪夫妇又去海南岛最南端的榆林要塞区大院内的元帅府住了一段时间，新年过后回到广州，住在白云山军区鸡颈坑招待所一号楼。林彪当时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内位列第六，但由于他当时还在养病，中央对他并无明确分工，所以他只配了一名秘书。

这位秘书姓W（此秘书应是吴欣峰——编者），来自上海警备区，主要负责收收文件，管管林彪的日常生活，基本是个行政秘书。1958年在彭德怀元帅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我曾同他打过一次交道，印象一般。林彪身边没有年轻的女工作人员，但有人向林彪反映，在海南时，这位W秘书同招待所的女工作人员有些轻佻表现。

林彪历来沉默寡言，秘书的事情都是交由叶群来管，但这次不知怎么来了兴致，他把W秘书叫来，提示他最近“有些轻浮的苗头”，希望他多加检点。

应该说，林彪的讲话还是很有分寸的：第一，他用“轻浮”而不用“轻佻”，问题的性质便有所不同；第二，只是“苗头”，还未成为事实。

不料，这位秘书的反应令所有知道此事的人们都深感震惊和不解，他忽然高声喊道：“你诬蔑！”

林彪完全没有料到，他这个当年的百万大军统帅竟会遭到一个小秘书的顶撞，他愣了一下，便气急败坏地大声申斥：“你，你还不接受教育，你走吧，不要在我这里工作了！”

哪知道，这位秘书又回敬了一句让林彪怎么也想不到的话：“你不是国防部长，你没有这个权力！”

林彪完全被气昏了，几十年来，在党内军内，哪有人敢对他如此放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手指着W秘书：“你，你，你快走！”

林彪和W秘书的高声争吵，惊动了一号楼的所有工作人员，大家纷纷跑来。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临时派来的保卫干部陈维纲把W秘书拉出楼外，批评了他，并赶紧向上汇报。

叶群在安慰了一阵子气得发昏的林彪之后，也向军区首长通报情况。此时，司令员黄永胜正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的是政委刘兴元。在向刘兴元简要通报了情况之后，她提出要军区为林彪选调一位秘书。刘兴元不敢怠慢，指示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立即把几个最拔尖的秘书的档案给叶群送去，供她挑选，其中就有关光烈的档案。他的档案一下子被叶群看中。然后是面试。关光烈一表人才，面目和善，精明干练，知识面广，既有机关工作经验，又当过连指导员，熟悉基层情况；而且他来自127师，这是全军历史最老的一支部队，其前身是叶挺独立团，战功赫赫，号称铁军，林彪早年也在这支部队。林彪、叶群都很满意。关光烈就这样被选中，当了林彪元帅的秘书。

他一干就是将近七年。开头将近一年，还是只有他一个秘书。1959年9月，林彪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接替在庐山会议上被定为“反党集团”头子的彭德怀元帅，兼任国防部长。关光烈一次对我谈起这段往事时说：“从庐山回到北京，一进毛家湾，就发现胡同里增加了很多便衣警卫。当了国防部长，这待遇就大不一样了。”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林办”成立起来了，陆续调来了多名秘书。“林办”主任自然非叶群莫属，关光烈则成了“林办”秘书们的头儿。

1965年，关光烈找了个理由，要求下部队工作，林彪、叶群批准放人。他仍回广州军区，被分配到127师任副政委，3年后升任政委。1969年底，127师所在的43军奉命移驻河南洛阳地区，改隶武汉军区。

◇ 陷入林立果一伙人的包围之中

他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在师政委的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军区很多领导都对他看好之时，一场政治上的灭顶之灾正向他袭来。1971年9月8日，正在军部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关光烈，突然接到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首长”找他有事，要他马上到北京去。关光烈从离开“林办”之后，就不再与之联系，他离开已经多年，而且这样的召见也不合程序，叫他去干什么？但是，他不能问。他报告了军政委王文德，王文德虽然也感到有些蹊跷，但是，副统帅召见，不能不去。关光烈一到北京，就发现事情糟了，林立果是在打着林彪的旗号，干非法的冒

险勾当。他陷入了林立果一伙人的包围之中。林立果向关光烈交了一部分“底”，提出了许多要求，什么从127师调喷火器，调40火箭筒，弄100套陆军制服……关光烈都一一托辞拒绝。

过了两天，林立果见他仍然一点也不配合，万般无奈，只好叫人给他买了一张软卧火车票，把他送上火车，放他去了。他刚回到部队，“九一三”事件便发生了。但他也像其他同级干部一样，在开始一段时间，对此一无所知。他也没有向任何人讲起这次进京情况。他不讲，其他人，包括军的领导，自然也不会问，这是规矩。

◇ 一人做事一人当

终于有一天，43军领导接到上级通知：要127师师长张万年和关光烈一起到郑州去，说是参加重要会议。

到了郑州，才知道是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以武汉军区政委的身份和他们个别谈话。刘建勋先同张万年谈，谈的时间不长，不知道谈了什么。和关光烈谈，便告诉他林彪发动武装政变失败后，乘飞机叛国外逃，要关光烈详细交代他到北京参加了什么活动，接受了林彪什么指示。关光烈都照实讲了。但刘建勋总觉得他还隐瞒了什么，一再要他打消顾虑，老实交代。刘建勋还特别对张万年的态度与动向极为关切，再三询问关光烈是否曾把去北京的情况透露给张。关光烈说：“我连自己的老婆都没告诉，我能告诉他吗？”这才不再问了。

在同我谈起此事时，他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能顺竿爬，乱说，害人。”

◇ 关进秦城

不久，关光烈被转送北京。负责“九一三”专案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和他谈了几次之后，认为他把事情都讲清了，纪登奎要关光烈安下心来，因为牵涉到这个案子的不止他一个人，要找个适当时机宣布将他和其他一些有关人员一起解脱。他被安排住在西山亚洲疗养院，对他的管理相当宽松，居住条件和伙食也都不错。他一心想早些返回部队，早些与家人团聚。却不料，以后竟再也没有消息。

打倒了“四人帮”，关光烈心想，前几年可能是受到了“四人帮”的干扰，这回他的问题该解决了。哪里想到，不久后的一天，他突然被强行押送到秦城监狱，一下子“升级”成了名副其实的囚犯。这意外的沉重打击，让关光烈陷入绝望、迷惘，各种疾病也向他袭来，他一下子老了许多。

关了一段时间，他在河南的妻子得知他的下落，要求探监，得到批准。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秦城。当关光烈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两个孩子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这个形容枯槁的老人与他们印象中的父亲联系起来。他们怯生生地低声问母亲：“这是爸爸吗？”这位妈妈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她该怎么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呢？

◇ 被定性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同伙”

中共中央新班子于1980年10月宣布，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开审判。北京负责审判两个集团的“主犯”，还有内定的60名“同伙”，则交由这些人原来所在的大单位发落。关光烈被送回武汉军区，他在这个名单中位列第44。

关光烈被告知：他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活动，罪恶重大，将在近期依法对他进行宣判。

1981年1月，在北京“两案”宣判之后，武汉军区机关也开大会对关光烈进行宣判。在通知关光烈准备参加宣判时，关光烈知道可能有一个给他戴手铐出庭和宣判后打开手铐的程序，他严肃地对办案人员讲：“我是什么问题你们都知道，我的为人你们也知道，你们若是叫我戴铐子出庭，到时候可别怪我叫你们难堪！”关光烈果然没有戴手铐出庭。他被判十年有期徒刑。我曾问关光烈：为什么不多不少，判你十年徒刑？他说：“因为我正好关了将近十年。”

◇ 出狱后以开店度日

关光烈出狱后军籍、党籍、职务、级别四大皆空。他在关押期间，因为没有正式定性，还是有工资的，即使扣除这期间的伙食费和零花钱，每月还可剩余一百多元，十年累计就是一万多元，这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目。关光烈向有关部门询问这笔钱的下落，答称“上交”了。上交的钱自然不能再退回来。开始几年每月只发60元的生活费。

他的妻子是个解放战争时期入伍、自尊心极强的老兵，1954年中央军委安排大批女兵转业，她在广州轻工业学校学了4年酿造，成了专业干部。她原住在127师家属区，关光烈遭审查后，她不愿看一些人的异样眼光，带着两个孩子住到她工作的学校，不肯再进营区大门。她先当了几年小学教员，后又当中学教员。关光烈到洛阳安置后，赶上地方改革开放，她的专长得到承认，被分配到洛阳一家啤酒厂当了厂长。为了生活，关光烈在龙门石窟附近开了个文物商店，主要做洋人的生意。他的身份逐渐为附近群众所知悉，大家对他很友善，并给予他一些帮助。到龙门游览的外国旅客最多的是日本人，不少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关光烈精通日文，口才又好，又懂历史、艺术，因而他的生意不错。

1987年7月，我去西藏为早年在平叛作战中牺牲的战友扫墓，返回时特地绕道去洛阳看望关光烈。我去了他简陋的家，又看了他的文物商店。因为是劫后初逢，我怕他伤心，有意不提“九一三”事件。他似乎反而比我通达，以调侃的语气对我说：“老迟，我现在开个小店，自由自在，可带劲儿了！要是早有这个政策，何必像当年那样，整天提心吊胆，受那份儿洋罪，到头来还不落好！”他这是反话正说，也是在安慰我，而这却徒增我心中几分苦涩，我还能说什么？

又过了两年，他应许多老友之邀，偕夫人重返广州。他的熟人、老部下极多，他南下的信息不但迅速在广州传开，湛江、海口甚至广西一些城市的老友、老部下也很快得到消息，纷纷邀他前去相聚。他长于书画，在广州向他求字求画的就有数十人，弄得他应接不暇。这中间我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详述了卷入那场政治漩涡的前前后后。

2002年5月，我又去洛阳看望关光烈。我先去他家中拜访，两天后他又来我的住处回访。每次相见我们都进行了无拘束的长谈。此时我已经接触过不少“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也看过一些一般人不易看到的材料，我对这次事件有了更多的思考。为了对这次影响巨大、深远却又被人为弄得扑朔迷离的政治事件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我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一些敏感问题。他一一直率地谈了他的看法。

□ 《南方周末》2012年2月16日

~~~~~

#### 【往事追忆】

## 为毛泽东一个人办的电视台

• 黄 海 •

1974年，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电视”，都是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像我这样年轻资浅的则寥寥无几。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一项重要任务。果然，根据中央的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广电部副部长王枫。10月29日我们抵达长沙。路上，我才知道我们此行的任务是为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毛泽东当时正在长沙。

开始一段时间，工作不怎么紧张，节目大部分是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之类。当时节目的传送方式是通过湖南电视台发射，毛泽东在电视中收看。因为节目内容都很“革命”，所以一般观众很难察觉出什么异常。不过也有例外，有一天，刚刚播完一个节目，老人家打电话要求马上重播一遍。同一个频道，同一个节目，连续播出两次，恐怕是“史无前例”的。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了好几个观众电话：“你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但当时怎么解释得清呢？只能推说“安排失误，接受批评”云云。

1974年底的一天，我们接到电话指示：准备上传统剧目。这一变动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剧团已有十来年没上演过传统戏了，演员要有一个恢复、熟悉的过程，服装道具也要制作、准备，工作量相当大。再说，怎样把节目发送出去呢？当然绝不能用原有的频道，否则观众都会看到传统戏，在那种年代，电视台公开播出旧戏如何得了？最后决定：开辟第五频道。于是，中央电视台派出专家，与湖南电视台一起昼夜加班，改装好发射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侥幸心理，万一观众偶然收看到了第五频道又怎么办呢？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1975年元旦这一天，我们调试的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来电话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第一，对节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于是群情振奋，不必细说。

谁知这一天的播出又引起了麻烦：湖南电视台接到几个电话，观众质问为什么播旧戏？电视台推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观众说，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听到的是湖南电视台播音员张林芝的声音……为此，我们再也不能装糊涂了，看来必须另寻途径，不能搞发射，只能搞有线电视。

1月2日，我们摄制组连同剧团演员全部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这里与湖南第九招待所只一墙之隔，离毛泽东下榻的六号楼只有几十米，架设电缆线很方便。我们在墙外大会议室里摄制节目，同时毛泽东在墙里面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这样，再也不会惊动观众，只不过又有不少人知道毛泽东的确切住所，况且在仅有一墙之隔的地方开展拍摄工作，会不会对墙内产生干扰甚至在安全上构成威胁？我想上面肯定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不得已才这样做，要不然为什么不早些采取这种形式呢？

1975年初，毛泽东的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老人家几乎每天晚上看节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中间从不休息，有的戏要连续看四遍。记得有一天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大家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哨音把我们惊醒，接待处打来电话要求马上送节目。我们像部队搞紧急集合一样，大家边穿衣边拿剧本边揉眼睛，跑步来到会议室，只几分钟，一切准备就绪，演出

就开始了。

2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毛泽东已经平安离开了长沙。警卫处于处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由于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毛泽东此次在长沙停留期间，精神很愉快，几个月内体重还增加了6斤。

回到北京以后，稍事休整，我们马上又投入了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工作任务主要是录制一批各种艺术形式的短篇精品节目，例如侯宝林的相声、闵惠芬的二胡、刘德海的琵琶、蔡瑶铣等人的南昆、北昆。

1976年初，我们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泽东录制家乡戏。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长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我们每天录制的节目，都是由第二天的专机送往北京。

这次我们以录制传统的湘剧、花鼓戏为主，当然也有一些京剧。剧团翻箱倒柜，把几十年的老底都悉数搬出，演员阵容也空前强大，有些已经离退休甚至于已经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艺人也纷纷被请回来，披挂上阵，重返舞台，一展当年风姿。其中花鼓戏老演员肖重硅就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点名要看她主演的《刘海砍樵》而临时从某工厂把她请回来的。

开始一个阶段，我们以录制完整的全本大戏为主，如湘剧《生死牌》、《百花记》，京剧《玉堂春》、《红鬃烈马》等等。记得大约从5月份开始，北京方面对剧目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戏，只录小戏，不要悲剧，只录喜剧。根据这一情况，我们预感或猜测到，可能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看大作品，也经不住悲剧氛围的艺术感染，只能用轻松活泼、带有喜剧色彩的小戏来调剂精神，缓解病情。这一阶段我们录制的节目以短小的花鼓戏为主，如《讨学钱》、《丑人计》、《扯萝卜菜》之类。

1976年7月16日，我们结束了近两年的特殊使命，奉命返回北京。我们回到北京一个多月时间，就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 来源：《钟山风雨》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